

#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变革自救的政治走向

田 澍

(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 兰州 730070 )

**[内容提要]**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长河中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变革自救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变革自救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

在明史研究中，嘉靖、隆庆、万历前期应为一个观察的独立单元。在这一时期，明代传统政治的惯性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政治变革的气象也是其时代特点。仅用腐败黑暗的一条主线来解读嘉隆万时代特别是嘉靖时代是不可能真正认清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的。回避嘉靖革新而一味地突现张居正改革的学风应该得到真正纠正了。在关注这一时期明代固有体制诸多弊端的同时，必须要用变革自救的另一条主线来审视嘉隆万历史的新气象。只有如此，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才会深入下去。本文仅为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 一、钦定大礼议是嘉隆万变革自救的真正起点

在明代 270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嘉靖至万历前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此之前的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 年），是明代创制时期，明代的根本制度在这一时期通过反复实践得以确立，对明代历史具有规范性的制约，被后世君臣视为“二祖之制”而加以效法。仁宗至武宗年间（1425—1521 年）是守成和腐败时期，其间虽有“土木之变”的典型事件，但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深刻反思，当然也不可能带来明代的政治转型，其守成和腐败的时代特征并未改变。世宗以非正常形式继承皇位，虽顺利即位，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较大的政治震荡，故世宗的即位和随即引起的“大礼”之争是认识嘉隆

万变革自救的最佳切入点。

传统的观点认为，以非常方式即位的明世宗应该感激杨廷和等老臣，嘉靖政治应该由杨廷和等人来控制，所谓“嘉靖新政”也只有由杨廷和等人来推行。世宗因“大礼议”而排斥杨廷和等老臣是嘉靖政治的不幸。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嘉靖政治予以悲观的评价，“腐败”、“黑暗”、“混斗”成了这一时期的代名词。但我们看到，随着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嘉靖政治全盘否定的学风被一部分学者所摒弃，他们开始从诸多方面对嘉靖历史予以重新反思，形成了一股嘉靖历史研究的潮流。因为不认真反思嘉靖历史阶段，就难以客观地认知隆庆和万历时期的历史特点。

尽管世宗是以特殊方式继承皇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的皇权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武宗的猝死的确给当时的臣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但这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政局已经失控<sup>①</sup>。朱元璋与朱棣建立的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这一非常时期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势力都不可能单独擅权，太后不得干政，宦官与阁臣相互制约，阁臣与九卿百官缺乏隶属关系，凡此等等，确保了皇权运行时的稳当非凡，不论皇位是否空缺，不论皇帝是否理政，这一格局都无法改变。这应是认识明代历史特别是嘉隆万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大礼议”中，不论当事人杨廷和还是明世宗，在当时，最后哪种议礼观占据上风都是不确定的。但就世宗最后取胜而杨廷和最终失败的原因需要认真探讨，并予以严肃对待。有些人认为大礼议中世宗的胜利是专制皇权高压或皇权强暴的结果，此论失之肤浅和偏颇。在明代，并不是所有皇帝个人的旨意都能得到群臣的认可，被否决的案例俯拾皆是。“大礼议”绝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次政治斗争，它是武宗生前拒绝立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一行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sup>②</sup>。否则，武宗生前群臣极力要求他从同宗中选立皇嗣的种种言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们的诸多担心也就是杞人忧天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礼议”是武宗败政的余波。指望杨廷和等人不费吹灰之力而轻易地弥补武宗的种种失误，迫使世宗乖乖就范，显然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大礼议所具有的确立世宗权威和组建新的人事结构的政治功能是其鲜明的特征。通过大礼议，世宗获得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他取得了议礼的胜利，这是为其尊严而战；另一方面组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人事格局，这是为其皇权而争。杨廷和集团是武宗猝死后皇位空缺时期所形成的一个特殊势力，他们试图借助“大礼议”向世宗的皇权挑战。而世

<sup>①</sup> 参见田澍：《明武宗暴亡后江彬被捕原因探析》，《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1期。

<sup>②</sup> 参见田澍：《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6期。

宗为了维护皇权，必须借助大礼议将其清除。不论人们对杨廷和集团是同情，还是崇敬，但绝不能无视此时日臻完善和日益巩固的皇权体制。换言之，明代皇权在这一时期并未衰落，朝臣不具备向皇权挑战的时机和能量。无视这一基本前提，一味地凸现他们的德行和事功是本末倒置，无助于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客观认知。在当时的体制下，在没有必然把握取胜的前提下，杨廷和要把自己漏洞百出的大礼观强加于世宗头上，本身就是一步险棋。一旦付诸言行，将不可收拾，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而与皇帝形同水火的对抗，已经将其送上绝路。杨廷和等人离开嘉靖政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尽管有人因此而极其厌恶世宗的皇权而予以严词声讨，但对现实的政治却无可奈何，只有通过放大杨廷和在这一短时期的“功绩”和突出世宗对杨廷和集团的镇压而慰藉心灵。在明代皇权体制下，如果杨廷和集团强迫世宗接受其大礼观，那才是明代历史的一大变态。之所以他们不会得逞，仅仅说明其失败是明代历史的常态，无需大惊小怪，尽管有人极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

钦定大礼之后，世宗重用张璁等“大礼新贵”是嘉隆万变革自救的真正开端。虽然在杨廷和等人依照惯例草拟的世宗即位诏书中提出了“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的主张<sup>①</sup>，并在世宗即位后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针对武宗败政的除弊活动，但这并非真正的革新活动。大礼之争使杨廷和与世宗的关系难以调和，得不到皇帝的全力支持，杨廷和等人也就不可能从事所谓的“革故鼎新”了。要杨廷和在与世宗皇帝的对抗中推行变革，那只不过是痴人梦呓罢了。所以，一味地搜罗和放大杨廷和在正德、嘉靖之际的“事功”，只能说明杨廷和在得不到皇帝支持下的无能，这是明代政治的正常现象，人们不必因杨廷和的离去而万分悲伤，明代历史还不会因他而止步。换言之，大礼议引发的政治震荡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有助于皇权的顺利转移，也有助于嘉靖政治的稳定与重建。

杨廷和最大的政治功劳就是在武宗猝死后按照明朝的基本制度协调各方迅速选定新帝并确保其顺利登基，而不是依照惯例在新帝即位之初的所谓“革新”。不论在武宗时期，还是世宗时期，杨廷和都无法与皇帝建立互信关系，故他不可能有效地对明朝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嘉靖三年（1524年）钦定大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以下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是树立了世宗的独立、自尊和自信意识，使其能将注意力转移到革新活动方面；二是击碎了杨廷和集团，清除了前朝弊政得以延续的传统势力，标志着杨廷和时代的结束，

<sup>①</sup> 《明世宗实录》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

为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是树立了世宗的皇帝权威，组建了君臣互信的新的的人事格局，使革新具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这些情况，是明成祖之后明代其它时期所不具有的，是嘉隆万变革自救新时代开端的重要标志。

## 二、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肯定和继承

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迅速取代了杨廷和集团，新旧势力的交替在短时期内有序完成，这一更替集中反映了明代皇权体制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在明代高度强化的皇权专制制度的空间之中，杨廷和集团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其结果是节节败退，被世宗所清洗。而世宗清洗杨廷和集团其实是在撕破百余年的政治关系网。对这一政局变化，应予积极肯定，而不应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张璁等人，并对其变革视而不见。凡是杨廷和等人想做而做不到的，或杨廷和等人不想做的，张璁等人大都能够做到，或付诸实践，双方的政治路径并不相同。杨廷和等人在世宗即位之后和张璁等人在钦定大礼之后，各自都有试图借助世宗树立公众形象的政治追求，世宗的皇权都是双方依赖的政治支柱，但皇权的天平因大礼议而倾向张璁等人。在世宗的大力支持下，张璁等人从多方面对明代弊政进行了刷新。其变革内容在拙著《嘉靖革新研究》中有较详细的论述<sup>①</sup>，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代大臣中，张璁是开启嘉隆万变革自救时代的中坚人物，是“中兴贤相”，不了解张璁，就不可能认清嘉靖前期政治发展的走向。在蔡美彪师等著的《中国通史》言：“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sup>②</sup>这是对嘉隆万变革自救时代特点的精辟概述。张璁和张居正分别是嘉隆万变革自救时代的开启者和终结者。张居正对嘉靖政治有独到的看法，对张璁等人的革新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和全力效法。但学界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理会，继续全盘否定嘉靖政治。韦庆远先生在谈及张居正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时论道：“如所周知，这半个多世纪风云多变，政局大起大伏，经过正德和嘉靖荒诞昏乱的恶政之后，已经达到了土崩鱼烂，国将不国的边沿”<sup>③</sup>。并在其所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中专辟一节，就张居正“对嘉靖其人和嘉靖朝政事的反思”进行了论述，认为张居正“对嘉靖朝前事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简直是视之为一场噩梦，一次浩劫。”<sup>④</sup>这一全盘否定嘉靖政治的观点并不符合史实。在张居正之前的明代诸帝中，世宗在位 45 年，是在位最久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时间是成祖、宪宗的两倍，

<sup>①</sup> 参见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sup>②</sup>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0 页。

<sup>③</sup>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sup>④</sup>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 页。

是孝宗、武宗的約三倍，故不應將 45 年的嘉靖歷史簡單地描繪成一團漆黑。事實上張居正並未全盤否定嘉靖政治，他將嘉靖前 20 年的歷史放在明史長河予以很高的評價，說：“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剝削殆盡。……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于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sup>①</sup>只要認真通讀《張太岳集》，就不難發現張居正對嘉靖前期和後期政治有着明確而又嚴格的區分。張居正成長於嘉靖前期，後來又居翰林院和內閣先後纂修《承天大志》和《明世宗實錄》，對嘉靖政治體之甚切，知之甚詳，認為嘉靖二十年（1541 年）左右是嘉靖政治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世宗以革新為主，此後開始怠政，並逐漸出現了革新之後的一些弊端。他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上疏世宗，言：“今陛下即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於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忱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陛下神聖獨運，萬機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sup>②</sup>到了萬曆初年擔任首輔之際，張居正也沒有改變這一看法，他對神宗說：“惟我世祖天縱聰明，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學，其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sup>③</sup>張居正對嘉靖政治的這一認識是極有見地的，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只有如此，才能搞清張居正變革的對象和張居正的施政特點等問題。而目前几乎所有的專著教材中對張居正變革的對象表述含混不清，缺乏令人信服的專門研究。

與韋慶遠先生不同的是，本人在《嘉靖革新研究》中就張居正“對嘉靖革新的肯定和效法”進行了專門的考察，並大量引用張居正肯定前 20 年世宗的言論加以說明，同時專門制作了“張居正效法嘉靖革新中君臣言行一覽表”，進一步凸現張居正對嘉靖前期的高度評價和認真踐行。旨在說明，張居正變革的對象是嘉靖二十年以後逐漸形成的各種弊端，其行政特點是在高舉“明代二祖”的旗幟下效法嘉靖前 20 年的明世宗以糾正萬曆初年的諸多弊政。為了便于理解張居正對嘉靖革新的繼承與效法，特將張居正效

<sup>①</sup> 《張太岳集》卷 18《雜著》。

<sup>②</sup> 《張太岳集》卷 15《論時政疏》。

<sup>③</sup> 《張太岳集》卷 40《進世宗御筆疏》。

法嘉靖革新中君臣言行的情况附表如下：

| 措施         | 效法言行  | 资料出处   |
|------------|---|--|
| 抑制外戚       | 张居正抄录嘉靖八年世宗查革外戚世封诏书全文，并要求神宗与李太后效法世宗和章圣皇太后，不得破例厚待戚畹。   | 《张太岳集》卷 30《请裁抑外戚疏》及同书卷 43《论外戚封爵疏》。               |
| 整顿驿递       | 张居正对驿递的整顿与嘉靖六年颁发的宽恤诏书的治理措施一致。   | 《张太岳集》卷 28《答应天巡抚宋阳山》及同书卷 32《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
| 速决重囚       | 针对李太后崇佛而不忍动刑，使重囚不能按时处决一事，张居正疏言：“嘉靖初年，每岁法司应决死囚不过七八十人，盖因有决不待时者，审鞠无枉，即时处决”，“故当时狱中系囚甚少”。神宗从其所请。 | 《万历起居注》二年十月十二日。                                  |
| 惩治渎职者      | 对营造昭陵官吏因偷工减料而使该陵沉陷一事，张居正要求依据嘉靖十年世宗因显陵殿阁渗漏而降旨严惩当事人之例来惩治昭陵渎职者。                                | 《万历起居注》二年十月二日。                                   |
| 御屏书写职官之名   | 为了使神宗能够知人善任和激励士气，张居正仿效张璁的做法，上疏要求在文华殿御屏书写天下职官之名。   | 《张太岳集》卷 38《进职官书屏疏》。                              |
| 内旨用人       | 张居正要求神宗效法世宗，不必等待会推，由内旨直接任命总督陕西三边缺员和阁臣等重臣。   | 《万历起居注》九年四月十二日及《张太岳集》卷 42《请简用阁臣疏》。               |
| 整顿诰敕       | 针对诰敕浮词泛滥，张居正检出嘉靖十二年张璁要求世宗整顿诰敕的题本和世宗的批示，敦促神宗效法之。   | 《张太岳集》卷 38《明制体以重王言疏》。                            |
| 申饬史职       | 面对史职的旷废，张居正以世宗谕令张璁之例，要求神宗“申明史职，光复祖制，以备一代令典”。  | 《张太岳集》卷 39《议处史职疏》。                               |
| 考察提学官与沙汰生员 | 对于提学官的玩忽职守和生员的冒滥，张居正以世宗考黜提学官和沙汰生员为例，予以严厉整饬。   | 《张太岳集》卷 39《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
| 禁毁书院       | 张居正踵武世宗，下令禁毁书院。   | 《续文献通考》卷 61《书院》。                                 |
| 整肃科举       | 面对试题的怪诞和应试文风的空疏，张居正仿效嘉靖革新中的做法，予以整顿，以倡导实学之风。   | 《明会典》卷 78《学校》、《涌幢小品》卷 7《制科盛际》及《张太岳集》卷 7《辛未会试录序》。 |
| 边防策略       | 张居正的边防策略继承了张璁等人为解决哈密危机所确立的通贡和好与内修武备的做法。   | 《张太岳集》卷 27《答甘肃巡抚侯掖川》及同书卷 29《答边镇巡抚》等。             |
| 推广一条鞭法     | 一条鞭法首创于嘉靖前期，并在此时开始由局部逐渐向全国推行，张居正在此基础上略作推广和完善。   | 《张太岳集》卷 29《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及唐文基著《明代赋役制度史》等。            |

### 三、嘉隆万时期阁权的由盛而衰

在朱元璋之后，明代历史有两次大的变局，一次是“靖难之役”之后的永乐时期，一次是“大礼议”之后的嘉靖时期。两次共同的特点是皇位异常更迭引发了人事格局的大变动，并由此带来了新的政治走向。前者以完善洪武体制为主，创制立法，规定了此后明代政治的发展路径；后者在“祖制”的框架内革除百年弊政，确立了此后明代政治变革的基本路径。明成祖以“非法”手段获得皇位，所引起的政治震荡较为激烈。明世宗以合法手段获取皇位，所引发的政治震荡较为和缓。“大礼议”就是这一和缓震荡的具体反映，也是武宗皇权向世宗皇权过渡的必然要求。换言之，“大礼议”真正反映的是如何维护世宗皇权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谁也不能怀疑和否定明代的皇权体制，任何人也不敢提出变革明代皇权体制的政治主张。世宗正是借助“大礼议”完全拥有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真正皇权，使明代皇权体制恢复了常态。这也是为什么在钦定大礼议之后任何挑战世宗大礼观的行为均以失败而告终的根本原因。

在世宗通过变革而强化皇权的同时，阁权也有明显的加强。在此问题上，学界的看法较为一致。从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相继的阁臣的行为中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巨变。这是在明代其它历史时期所不具有的特殊现象。不深刻理解“大礼议”的政治功能，也就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皇权对他们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力，其所有的主张得不到皇权的支持，他们束手无策。在与皇帝的交往中，刚强也好，阴柔也罢，一旦皇帝翻脸，都将受到严惩，手中的权力顷刻间化为乌有。另一方面阁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在这一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将其在皇权体制内的最大能量发挥到了极点。学界热衷于渲染这一时期所谓内阁“混斗”的负面作用，但换一角度看，这一“混斗”的背后在于阁权特别是首辅权力的有限强化（当然是在皇帝所能忍受的限度内的强化）。

首辅权力的强化到张居正而达到极致，但也预示着阁权强化的走向将会逆转。尽管有人将张居正的阁权放大到传统宰相权力的层面上来认识，但阁权受制于皇权的根本属性没有丝毫变化。“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

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sup>①</sup>高拱因言：“十岁天子而能自裁乎”而被立即驱逐，张居正虽无此言论，但其行为仍然是高拱的继续。但与高拱相比，张居正的阁权过份依赖宦官，必将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在其柄政时，“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们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没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sup>②</sup>其权威虽得到了上层即神宗、李太后和冯保一度的支持，但却受到了来自下层的反对和否定。人们反对他就是对其越权的否定，这是明代传统的政治精神，不能因偏爱张居正而无视这一精神，更不能无视当时巨大的现实力量。尽管张居正个人的专断独行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毕竟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其行为对他之后的阁臣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内阁对明代政治的影响力急速减弱。嘉隆万时期强化的阁权因张居正则走向死胡同，他没有做到继往开来，自张璠之后不断强化的阁权因张居正的物故嘎然而止。

在张居正之后，张四维、申时行先后为首辅。他们为了与张居正划清界限，争取人心，推行与张居正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一切务为宽大简易。张四维“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博惇大之名，阴行排挤。”申时行“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sup>③</sup>而“性刚负气”、不与张居正合作的王锡爵在担任首辅后，提出了强化六部权力的主张，进一步推卸内阁的责任，说：“臣请一切章奏悉下部议，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当止即止，以言责事，以事责功，卓有执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议论总条贯而归六部，六部题覆，别白黑而定一尊。……夫威福还朝廷，政事还六部，此先臣徐阶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题覆，阁臣之票拟，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岂得自分彼此？”<sup>④</sup>这与张璠、高拱、张居正等人突出阁权和强化阁权的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的结果是部权没有得到强化，而阁权明显流失，张居正之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内阁的软弱无能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迅速衰亡。

<sup>①</sup>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63 页。

<sup>②</sup>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70 页。

<sup>③</sup> 《国榷》卷 72，万历十一年四月戊午。

<sup>④</sup> 王锡爵：《定国论一政体疏》，《明经世文编》卷 394。